

大学人文教育



第二辑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大学人文教育中心 编辑部 编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

DA XUE REN WEN JIAO Y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人文教育 (第二辑) /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大学人文教育》编辑部编. 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辞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7-80682-617-1

I. ①大… II. ①大… III. ①人文科学-教学研究-高等学校-文集 IV. C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1494 号

大学人文教育 (第二辑)

DAXUE RENWEN JIAOYU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大学人文教育》编辑部

责任编辑 杨正波
复 审 帅初阳
终 审 杨宗义
封面设计 武 韵
版式设计 王 跃
责任印制 严红兵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辞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印 刷 四川嘉创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11. 5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7 80682 617 1
定 价 20.00 元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出版社掉换。
· 市场营销部电话: (028) 87734332 87734313

学术委员会

主任:陈洪(南开大学,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中文学科主任委员)

李良荣(复旦大学,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新闻学科主任委员)

成员:崔希亮(北京语言大学) 陈思和(复旦大学) 高钢(中国人民大学)

黄德宽(安徽大学) 蒋承勇(台州大学) 蒋述卓(暨南大学)

蒋晓丽(四川大学) 雷跃健(中国传媒大学) 李希光(清华大学)

尚永亮(武汉大学)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 张福贵(吉林大学)

张昆(华中科技大学) 周宪(南京大学) 朱庆之(北京大学)

主编:曹顺庆

副主编:雷汉卿

编委会

主任:曹顺庆 熊兰

成员:曹峻冰 陈思广 傅其林 李苓 刘黎明 刘颖 邱晓林 吴建

徐新建 阎嘉 张小元 杨效宏 杨文全 俞理明 张勇

学非易事。多少学子昼夜勤学，却依然不得登堂入室；书山崎岖，令许多学者徒峰兴吧而茫然无措。如登名山，须有奇伟瑰丽之景，使游者苦后余甘、乐而忘返方为妙境；书亦如是，唯有深根固本、启迪智慧才能激发兴趣，使学者乐之好之，方为佳构。

于是，我们推出这套《达标捷径》。

捷径者，近便之路也。直言其事，不拐弯抹角即为“近”；删繁就简，不纷纭杂沓就是“便”。更兼不落俗套，风格独具方为“捷”。你看，书中的栏目设置无不为了“捷”而存在。归纳知识纲举目张，讲练结合层层递进，培优育能不遗余力，是为“捷径”：

一、学法指要——提纲挈领

几句简言，去粗取精，指出课时知识要点；数行文字，条分缕析，归纳解题思路方法。如一份精致的旅游指南，虽短小却不会让你有错失名山胜水的遗憾；附几句解说，教登峰览胜之法，便可悠游于美景之中。

二、四点精析——解惑答疑

精选几道例题，用精当到位的讲解，凸显课时重点、难点，澄清易错易混点，不拖泥带水，不混沌不清。剖析精准全面，要言不烦。如临深山巨谷，先授攀援逾越之术，得此便可涉险无虞。聆受之余，别忽略还有些贴近课时内容的小知识，可提神畅气，有所补益。

三、达标训练——以点带面

摒弃题海战术，不以弄偏搞怪为巧，不靠重三叠四取胜；推崇学以致用，以知识点为基础，力求举一反三。靠课堂训练夯实根基，用拓展视野题提升能力。如同亲身游历一处处景点，有披荆斩棘的艰辛，也有捷足而登的快意。于是，在循序渐进中自得探幽索隐的法门。

四、超越自我——升堂入室

选用一两道难题，机敏者可因了悟而茅塞顿开，广博者可由融通而迎刃得解。正是“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好似登峰造极，到此方知学之真味。

倘若意犹未尽，单元测试 题可供一试身手，而期中、期末测试题也是你用武之地。须知，你取得的成就越大，越坚定我们对“捷径”的理解。

分享一本好书，如赏胜景，其喜洋洋；如游佳境，其乐融融。希望我们共同努力来印证学实易事。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我们一以贯之的追求。因此，我们披肝沥胆，力求至善尽美。同时，您的关爱也是我们完善自我的不竭动力。

前 言

2008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创办的刊物《大学人文教育》第一辑出版，这是我们对大学人文教育进行思考的一个窗口，希望建设成为一个学术研究平台。紧接着，“中华文化”素质必修课获得国家级精品课程称号，“比较文学教学团队与创新人才培养”项目获得国家级教学改革成果二等奖，“原典阅读与中华素质课课程改革研究”获得省级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中华文化”教学团队被评审为省级教学团队。现在《大学人文教育》第二辑即将付梓，我院以原典阅读为理念的中文学科系列教材也即将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些都反映了学院改革的最新进展。

从2009年开始，我院在“高质量，多样化”的原则指导下探索本科生毕业论文改革的思路，在经过认真调查的基础上制定了具体实施办法。本期论文也反映了这一调研的情况，如操慧副教授的《浅论转型期高校人才培养的“三力”构建——基于四川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改革调研的思考》，即立足高校人才培养的观念转型，通过对四川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改革调研的分析，论述了高校人才培养的“三力”即适应力、发展力、创新力构建的必要性与战略性，并以调研的实证结合专业发展的实际，提出了人才培养中作为教学、教育的两大主体的互动与共建的可行路径。

2009年秋季，我院为四川大学吴玉章学院开设了“文学欣赏”课，这是大学人文教育的系列课程。该课程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并促进学生的思考。吴玉章学院哲学系2009级本科生李辰的《人文课之于大学生个体的意义》提出了这样的认识：在理想的状况下，文学人文课应该是对一系列经典文本的阅读，一个深刻全面的价值体系，显然必须要靠大量的经典阅读建立起来。没有了经典名著作为立身之本，就摆脱不了随波逐流的宿命。他从一个本科生的角度强调了原典阅读的重要性。吴玉章学院2008级英语专业的韦晓晓在《浅谈“文学欣赏”课程带来的收获和思考》一文中，谈到了自己听课的收获和思考，同时提出了对本课程的一



些建议和期待。

除了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内容外，原典教育的理念在本期得到强调，如曹顺庆教授的《论当前文艺学学科危机以及研究生培养问题》指出了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出现的“多而空”、“窄而离”的问题，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还需要从阅读传统文化原典和西方文化原典做起，做到融会中西。刘亚丁教授的《课堂教案：经典小说〈罪与罚〉的新解读》一文以教案的方式将《罪与罚》纳入俄罗斯知识者文化抉择的大视野来重新解读，其目的是要使研究生意识到：已被前贤反复阐释的经典小说还是有解读空间的。而张朝富老师在《另类孕育着的自由和谐：孔门教育的现代启示——从宰予说起》一文中认为孔门平等活泼的自由教育场景，可以给我们更多的现代教育启示。该文不失为对经典的另一种解读。

本期论文的视角还触及国外发达国家的本科教育状况，如吴建教授的《美国本科生教育的初步考察》通过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实地考察与研究，介绍了美国高等教育中的本科生招生制度、本科生培养、本科生的经验性教学等情况，有助于我们认识美国本科生教育的现状。梁昭博士的《什么是“世界文学”？——哈佛大学“世界文学”本科课程浅谈》通过介绍美国哈佛大学的本科通识课程“穿越文化的书写：世界文学”的课程目标、纲要、教材和教学手段等，向我们提供了国内关于外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课程改革的参照。

值得一提的是，本期所刊登的历史文化学院诸位老师有关古代人文教育学家、书院的经史教育、人文教育中的历史教学等文章，拓宽了讨论的视野。

2010年5月15日

目 录

曹顺庆	论当前文艺学学科危机以及研究生培养问题	1
刘亚丁	课堂教案：经典小说《罪与罚》的新解读	8
侯 洪	浅谈生态传播的研究与教学	18
王冀艳	肖娅曼 浅谈理论型语言学课程的教学改革	22
刘春卉	现代汉语课的学科定位及相关教材存在的一些问题	27
任 真	试论教学中文学理论与哲学思想的关系	31
傅其林	从“文学概论”教学反思研究型学院的本科教学	35
梁 昭	什么是“世界文学”？	39
王彤伟	高校“古代汉语”教学随想	48
雷汉卿	研究型大学本科生人文境界培养的构想及其措施	52
陈聿雷	社会转型背景下高校人文学科教育刍议	60
吴 建	美国本科生教育的初步考察	66
彭 虹	深度互动——提升教学效果有效路径	73
干天全	读书的几点认知	77
张朝富	另类孕育着的自由和谐：孔门教育的现代启示	80
李天琦	将传媒人的品性锻造作为高校传媒教育的核心	85
李 玮	浅析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的“5W”转向	90
孙志宏	张 瑞 对在校研究生学习状况的思考	95
唐 寻	浅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素质养成	100
李 倩	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几点思考	104
操 慧	浅论转型期高校人才培养的“三力”构建	109
粟品孝	不朽的文化之“神”	115



王东杰	“教育的自身价值观”：任鸿隽对学术自由的认知·····	119
李晓宇	四川省城尊经书院的经史教育·····	140
韦兵	提升文化素质 培养软实力·····	151
周鼎	史以载道：历史学与当代大学素质教育·····	154
张循	教授“常识”与纠正“常识”：历史教学在通识课程中的功用·····	158
周毅	通识教育在精品课程建设中之功效·····	162
李辰	人文课之于大学生个体的意义·····	167
韦晓晓	浅谈“文学欣赏”课程带来的收获和思考·····	171

论当前文艺学学科危机以及 研究生培养问题

曹顺庆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内容提要：我们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多而空”、“窄而离”。文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是西方模式的，开设的课不少内容多是重复的大而空的概论性课程。要改变这种局面，还需要从阅读传统文化原典和西方文化原典做起，力争做到融会中西，别立新宗。

关键词：文艺学 原典 传统文论 西方文论

当前中国的教育繁荣兴旺，却也危机四伏；当前的文艺学学科也大致如此，危机重重。

危机在哪里？

随着钱锺书、季羨林等学术大师的离去，现在中国真正进入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这就是我们当前最大的危机！

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无数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巨人，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学术大师一起，如一颗颗灿烂的明星，在夜空星光闪闪，照耀古今。在轴心时代，西方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有孔子、老子、庄子、孟子；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出现了众多的文学大师，如：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而中

国比他们更早就出现与之相媲美的文学大师，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即使到了近现代，即便是在八国联军的侵略下，在日本铁蹄的践踏蹂躏中，在国共内战的隆隆炮火中，中国的学术界，仍然是人才辈出，大师云集。从梁启超到王国维，从钱锺书到季羨林，这些学术大师甚至是群体产生出来的！例如，文学上的鲁迅、沈从文、巴金、茅盾、老舍、曹禺、穆旦等，学术上的王国维、刘师培、陈寅恪、梁启超、黄侃、冯友兰等，我们还可以举出一大批堪称学术大师的名家。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我国教育在许多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如：教育设施和环境的改善，受教育的人数以及



受教育的时间的提高等；在高等教育方面，大学生、研究生也不断扩招，据教育部资料统计，2009年，我国大学生毛入学率为23.3%，在校大学生有两千多万！未来几年，这一数字还将增长。另外，还有大批在校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教育事业看似十分繁荣。然而，数量的增加并不代表质量的提高，学位的高低与学术成就的高低也无必然联系。在人才培养上，我们的教育在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上出现了严重失误，不但没有产生可以傲视全球的大家，甚至几乎没有产生堪与王国维、鲁迅等相媲美的学术大师，以至钱锺书、季羨林在当代中国成了一个高山仰止的神话，学者及广大青年对钱锺书、季羨林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诚然，钱锺书、季羨林学术神话的形成以及“钱学”热的兴起，有着正面的意义，这至少反映了学界及广大青年学子对学术的景仰和向往。但从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说是学界的悲哀：偌大一个中国，十几亿众生，当钱锺书等大师级人物相继去世以后，竟再也找不出人来承继其学术香火。中国教育究竟怎么了？

自从进入后工业社会以来，社会到处都在复制，我们的教育也是如此，而且整个还是一个庞大的复制品工厂。一方面，硕士、博士的人数不断地在增加，在校博士生已超美国。而另一方面，原有的大师一个个离我们而去，现有教育机制又很难培养出大师来。到现在为止，我们连“离去”的资本都没有了。现在，许多学生包括研究生读不懂中国

文化原典，甚至不知“十三经”为何物。外语学了多年，仍不能读懂外文原著，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开不了口。李白的浪漫主义、杜甫的现实主义以及后殖民、后现代、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等西方文艺理论学了一大堆，却离王国维、钱锺书、季羨林等大师的学养差得很远。这样的教育继续下去，不要说与高素质的人才培养目标相差甚远，就连基本的教育目标都很难实现。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不正视它，恐怕再过六十年也不可能再产生出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来，更不用说是产生如王国维、鲁迅、陈寅恪等一批泰斗级的学者了。此非我本人杞人忧天，而是“此诚学术危急存亡之秋也”。

面对这样一个教育现状，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人才断层？我们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到底怎么了？在哪里出了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深刻反思的大问题，我们文艺学研究生教学也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而且存在的问题并不比其他学科少，甚至还更严重些。我们没有回避的理由，更不应该再讳疾忌医。

在我看来，造成这种无大师时代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其中至少有一点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本身出了问题。我们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多而空”、“窄而离”。

何谓“多而空”？就是我们研究生课程设置的课太多、学习效果不明显。单课的种类就有公共课、专业课与必修课、选修课多种

系列。公共课又分为外语、政治，而外语又分听力、精读、写作、口语等，政治又分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经典选读；专业课又分必修课、选修课、学术道德规范教育课等等，修满了多少学分才能达到毕业要求，博士研究生还有相当重的科研要求。这样的课程设置看上去很规范，很有体系，也很完整，但实际效果如何呢？实在有点令人怀疑。好多硕士研究生都在私底下抱怨，说研究生课太多，研究生教育几乎是本科教育加强版，读完了，感觉学到的新东西不多。这是“多而空”的表现之一。

并且，开设的课不少内容是重复的大而空的概论性课程。课程设置得多似乎意味着这门学科师资力量强大，但不无遗憾地指出，在这样一种伪逻辑下，暗含着某种深刻的危机。为了多开课，也满足学生专业学习需要，很多学校会提供一份含量很大、可供学生自由选择的课表。然而，你仔细一看，课程很多内容是大而空的。其实，课开得再多，如果都是落不到实处的大而空的概论，那就等于没开，而且浪费一些原本有自己学术理想追求学生的时间。

那何谓“窄而离”呢？所谓“窄”就是高校学科越分越细，专业越来越窄。这种教育方式培养了很多精于专业的“匠”，却没有高水准的“大师”。我们不少学校文艺学科研究生课程设置也是这样的：文艺美学研究、文艺学基本问题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西方文学批评史、马克思文学理论研究、艺术思潮和艺术流派研究、现当代艺术美学研究

等。整个课程都直接围绕文艺学科来设置，这样一种方式对学生本专业的知识是加强了，但对学生的学术视野训练却是不利的。研究生专业教育在加深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有一种大文科意识，知道文，也应知道史与哲，掌握博与专的关系，做到以专带博，以博促专。

所谓“离”，是指我们读的一些东西离原著太远。仔细琢磨一下学术大师的成功之路，他们大多具备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他们精通古文原典、精通外语文献，这就使他们能做到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据说习武之人，最难的是打通“任”、“督”二脉，只有打通此二脉，才能练到上层武功，而外语与古文就是我们做学问的“任”、“督”二脉。我们的很多学生尚且不知“任”、“督”二脉在哪儿，让他们知道如何打通就更成问题了。目前在读的研究生们多少会学一点《诗经》《楚辞》《论语》《孟子》，但这种学习方式基本上是走样的，学生的读本多半是古文今注今译版本，而并非直接读文言文原文。这就使得学习与原著隔了一层。读西方的文艺理论，多半是翻译过来的二手货，在基本看不懂外文原文或者干脆不读外文文献的情况下，就夸夸其谈地大肆向国人贩卖西方理论。我们不是说不可以参照译文来研究，而是强调应该尽量阅读外语原本，因为不读原文，一定会出问题。遗憾的是，我们的不少学生依然使用厚厚的贩来的“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中国式的西方文论专著。可想而知，在这种“多而空”、“窄而离”的教育方式下，只



会造成学生知识不扎实、学风空疏，怎么可能产生学贯中西的大师呢？

那我们文艺学研究生教育的出路在哪里？

其实，鲁迅早在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就已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在时下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对于我们文艺学教学同样有启发。

“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就是要求我们认真学习、继承我们传统的优秀文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从1995年开始，我开设“十三经”课程，迄今已有十余年了。我以前是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同时，我又是研究比较文学的，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对西方文化有个基本的认识。1994年回来后，我就着手开设“十三经”课程。换句话说，我之所以要开设“十三经”课程，是与我的经历、思考相关的。

第一，在如何对待传统上，我曾将我们中国和周边东方国家作了一个比较。比如，同属于我们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与经济发达国家一样，他们有很多重要的工业产品、重要的高科技，如我们中国市场上就到处可见“三星”、“现代”、“丰田”、“索尼”、“松下”。虽然他们都很现代化，但是他们对待传统却与我们不同。日本很多传统都保留得非常好，包括衣、食、住、行方面；韩国对他们的传统文化也非常尊敬，如韩国的钞票上印着的就不是总统头像，而是他们的古文化

人。印度也大致如此，西方国家就更不用说，所有国家对待他们的传统文化都与中国现当代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很大的区别。区别在哪里呢？我们现当代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是一种负面看法：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被动挨打的“祸根”，是实现现代化的“绊脚石”，不打倒传统文化，中国就不能进入现代化，就不能繁荣富强。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日本、韩国没有打倒他们的传统文化，而是在尊重他们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实现了现代化，而我们实现现代化却非得将传统文化全部打倒不可，甚至我们全盘打倒了传统文化，我们的现代化却还没有他们走得快？这种对传统的负面看法给我们现当代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抛弃传统文化的更为严重的结果是，我们不仅没有达到我们当初的目的，反而使我们失去了自己文化的“根”，由此就导致了很严重的后果。一个直接的恶果，就是空疏学风日盛，大大地伤害了我们学术界与教育界，害了大批青年学生，造成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

第二，由于我们都对传统文化不熟悉，这就造成了我们文化上的“失语”时代，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失语的根本害处就是缺乏创新力，缺乏自主创新性。不学传统文化，读不懂中国古代典籍，必然会“失语”，这是肯定的。“话语”的实质是一种规则。这种规则是在我们的经典中形成的。例如，我们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个基本的“话语”，即“言”和“意”的关系问题。语言始终不能穷尽意义，这是我们的话语规

则，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话语规则大不相同。西方认为，语言和意义是一致的，没有没有语言的意义，也没有没有意义的语言。诚然，后来发展到当代现象学时，产生了一些变化，但这仍然是他们的基本规则。而中国的基本规则则强调“言不尽意”。如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周易》的“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庄子的“得兔忘蹄、得鱼忘筌、得意忘言”，一直到我们古代文论所追求的“言外之意”、“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味外之味”、“故其妙处莹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些看法和基本规则都是一样的从先秦一直延续到了明清。包括禅宗的“不立文字，以心传心”、文论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等，都是这些基本规则的反映。这些基本规则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经典开始逐步形成的。西方文论中的基本规则如“模仿”论、“悲剧”论，也都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开始形成的。那么，我们的这些规则为什么会丢掉呢？因为我们都没有去读过“十三经”，不知道传统文化的路数，所以必然会“失语”。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在一个没有学术大师时代的原因。可以说，一个“失语”的时代，自然不可能产生学术大师；一个无学术大师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失语”的时代。

就文学理论来说，我们传统的文论基本上从现实的文学生活中消失了，目前的文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是西方模式的，对于西方的文学理论我们正在亦步亦趋地效颦。我们已

经没有了自己的话语，开口就是西方的。年轻人对于我们祖先的东西知道得越来越少，相反对西方却越来越感到亲切，很多人满口都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令人痛心疾首地糟糕到了“言必称希腊”的地步。但我们自己的文化历史和传统，在我们的青年学者甚至一些中年学者中间，却非常陌生。当今的学生，有几个人真正地读过“十三经”、读过“诸子集成”、读过“二十五史”。当初我们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赶上西方，费时靡日，我们至今仍处于追赶西方的被动状态。长期地追随西方，我们的创新活力正在丧失，现在似乎只能永远跟在西方的后面，整体性地成了西方的“尾巴”。

在中国，有中文系的地方都有研究文学理论的，再加上社科院、文联以及其他单位的专职研究人员，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队伍是非常庞大的，但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却非常落后，缺乏原创性，没有产生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影响的重大理论。迄今在中国有影响的文学理论都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历史、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等，情况也大致与这差不多。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失语症”，就要读“十三经”等文化原典。没有读过“十三经”，没有读过“诸子集成”，没有读过“二十五史”，没有学习传统文化经典，就根本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国传统话语，所以我要开设“十三经”这门课。通过开设“十三经”课程，背诵《文心雕龙》《文赋》《诗品序》，让大家慢慢地学习中国传统经典话语。只有真正地、认真地、好好地学过中国文化典籍，



才谈得上拿来运用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读了“十三经”，就不“失语”了。如有些人虽然中国古代文化功底很好，但他仍然将西方话语“拿来”解析中国文学，这样做还是会“失语”的。所以在我看来，读“十三经”仍是一个基础，我们应通过这个基础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

有人见我十分强调中国文化原典，便认为我是复古派，甚至是所谓“文化原教旨主义者”，其实这是误解。应当说，我不但是彻底的复古派，我也是彻底的西化派。我认为，我们现在不仅是“中化”不够，西化也很差。表面上，我们文艺学十分西化，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西方，其实我们并不真正懂得西方，因为我们学的西方文论，常常不是真正的西方文论原典，而是翻译的二手西方文论、二手西方文论，甚至是误译满篇伪西方文论。一些教西方文论的人只读译文，从来不读外文原文，不求甚解，往往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这是文艺学学科最大的问题。

目前，我们研究中国文学的理论框架、学术规则、学术范畴，如“内容”、“形式”、“典型性”、“文学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象征”、“荒诞”、“颓废”、“感伤”、“现象学”、“阐释学”、“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都是从西方贩来的。运用这些理论进行文学研究可不可以呢？当然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说李白是“浪漫主义”的、杜甫是“现实主义”的。但是这些术语和规则毕竟是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的，

不是产生于中国的，是西方的文论话语，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论是有一定距离的。很多同学在学习西方文论的时候，主要依靠翻译本，外语根底不好，不是直接去读原本，又没有到西方进行过深刻的体验。这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是有很大问题的。首先，读译本和读原本感觉是不一样的。由于译者的介入，原有的话语变成了译者的话语，原文的信息、思维方式、文化内涵等都会产生变异，读者读到的是译者对于原语言的理解，而非自己对原本的理解，与原著隔了一层，与真理就隔了“三层”。其次，现在的翻译质量堪忧。现在好多学术著作的翻译是急就章，或者是为了某种任务，错译、乱译、漏译现象严重，加上译者理解有问题，语言又不达意，难免造成以讹传讹，以至有的学者说，哪里译文看不懂了，哪里的翻译就出现了错译。学术研究建立在此种基础上是经不起时间检验的，我们的学人以此种方式来研究是可悲的。

为了加强“西化”，做到如鲁迅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从1998年开始，我就直接用英文版教材给研究生开设文学研究方法课程：当代西方文论导读。这门课要求每位同学都必须在课堂上用英语抽读西方文论著作。经过一番艰苦训练，同学们虽然感到太苦，但收获良多。我的用心就是试图做一个教学改革尝试，让同学们读原汁原味的东西，获得实实在在的知识与智慧，而不是大讲空论，凌空蹈虚。不是在岸上大讲游泳理论，而是让同学们跳下水去学会游泳，

教师只是在旁给予必要的点拨与指导。这样既可以提高研究生们的英语运用能力，又能促进专业学习，相得益彰。

读中国文化原典不是我们的目的，学习西方原著也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最需要的是创新、是“别立新宗”。而要创新，要“别

立新宗”，我们就应尊重、学习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并力争做到融会贯通，学通中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文艺学研究生，为中国文艺学学科发展开出一片天地来！



课堂教案：经典小说《罪与罚》的新解读

刘亚丁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内容提要：本教案是对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长篇小说《罪与罚》的新解读。教案将《罪与罚》纳入俄罗斯知识者文化抉择的大视野来关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9 世纪 40 年代受空想社会主义等西方思潮影响，50 年代以后皈依东正教，首倡“土壤”理论，回归俄罗斯传统文化。作家本人对文化试错的反思，映射为《罪与罚》中拉斯柯尼科夫文化抉择的叙事深层结构。借鉴格雷马斯符号学的矩阵图，分析体现文化冲突的主人公犯罪和救赎的叙事轴，同时分析其他人物在两种文化之间的抉择，由此得出结论：《罪与罚》表达了对作家本人文化试错的理智清算，对俄罗斯民族文化抉择的深刻反思，是文化试错的民族寓言。本教案对《罪与罚》重新解读的目的是要使研究生意识到：被前贤反复阐释的经典小说还是有解读空间的。

关键词：《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 教案 阐释 拉斯柯尼科夫

针对博士生和硕士生，应将《罪与罚》的学术研究史作一粗略梳理，应注意培养研究生注重经典作品的学术研究史的意识。若针对本科生，这部分可以略去不讲。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的《罪与罚》（1866）是一部内涵非常丰富的小说，因此对它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其内涵学者们主要从四种角度切入。其一是从社会历史观点切入。作品发表的次年，1867 年俄国批评家皮萨列夫就指出作品表现了“生存竞争”

[Pisarev, 157—158]。20 世纪苏联的学术研究中依然注重这部小说对当时社会历史的深刻描写，“家庭联系的崩溃、堕落、犯罪、卖淫、野蛮、酗酒、凶杀、告密、对人的尊严的各种形式的压制和侮辱，这一切在陀氏的这部长篇小说中，是作为盛行着‘人对人像豺狼一样’的法则的社会生活的必然表现来加以反映的”[Д. Благой, 129]。美国学者也关注《罪与罚》中反映的当时俄国的现实危机，如酗酒、卖淫、犯罪、贫困、新一代的

观念、城市等问题 [Fanger, 59—65]。中国学者也有从这个角度来概括《罪与罚》的主题的 [刘翹, 109—101; 彭克巽, 136—138]。其二是以作家传记为基础来切入。如格罗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格罗斯曼, 433—468]。其三是从宗教文化学的角度。德国学者赖·劳德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解读《罪与罚》，提出了作品中大地母亲复活的神话 [赖·劳德, 301]，中国学者也多有从这个角度切入的 [何云波, 77; 赵桂莲, 228—231, 236—247; 王志耕, 141—143]。其四是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切入，关注《罪与罚》中包含的心理分析和心理治疗等问题 [马·琼斯, 95—117]。这些研究无疑直指作品要旨，富有启发性，但是《罪与罚》犹如一座富矿，依然诱使学者携着新的工具走近它，去发掘它的新的层面。因此不妨将作品纳入俄罗斯知识者文化抉择的大视野来关照，借鉴格雷马斯符号学的矩阵图进行叙事轴分析，将对《罪与罚》文本细节的领悟与陀氏传记的相关事实相贯通，这样我们就会发现：《罪与罚》表达了对作家本人文化试错的理智清算，对俄罗斯民族文化抉择的深刻反思。

第一节 时代文化语境和作家心境

应让学生意识到：知人论世是文学研究中传统的、重要的，也有效的研究方法，在对经典作品进行新解读的时候它同样有效果。研究《罪与罚》的文化蕴涵，应该先从这部小说创作时作家个人和时代文化语境入手。从表面上看，陀氏的人生轨迹与同时代的其

他俄罗斯作家迥然相异，但如果将他置于俄罗斯知识者文化抉择的主要流向中来看，他们可说是异中有同，殊途同归，都体验了先学西方文化后回归本土文化的心路历程。

19世纪俄罗斯知识者都面临着在本土文化和西欧异质文化之间的抉择。在19世纪的前五十年，俄罗斯知识者中的先进分子都致力于向西方学习，他们要以他们所认同的先进的西方文化来改造落后腐朽的本土文化，这种追求体现在文化的制度和精神的若干层面。十二月党人从西方文化中借鉴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来取代专制制度，别林斯基等从西方文化中效法宪法精神和政治理念以革除本土的农奴制和专制制度，普希金、莱蒙托夫从西方文化吸纳“恶魔”般的个人主义以克服农奴制赖以存在的奴才主义 [刘亚丁, 3—10]。陀氏本人也成了学习西方文化热潮中的一分子。1847年他参加了传播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了傅立叶学说最虔诚的信服者。他的同志彼·谢麦诺夫一天山斯基回忆说：陀氏“阅读圣西门、傅立叶的社会主义著作”，并热心加以传播。被沙皇政府逮捕后，他依然坚持自己是傅立叶的信徒。他还在小组上朗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在这封信中别林斯基提出了废除农奴制的纲领 [П. Семенов-Тан-Шаньский, 209; 格罗斯曼, 132—158]。足见陀氏在借鉴西方文化改造俄罗斯本土文化这一点上与当时的先进知识者是声气相通的。

19世纪中期，俄罗斯的先进知识者出现精神激变，由学西方转而重视自己本土的资